

神山背后传来边陲少年的欢歌

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教室落地新疆温泉县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在祖国边陲，新疆的西北端，坐落着这样一个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的小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这片仅有7万多人口的静谧之地，其三面被高耸入云的连绵雪山所包围，像是被巨人藏入怀抱的一颗稀世之珍，惊艳动人，却隐秘地不为外界察觉。

9月中旬的晚上，温泉县已倍感寒意，至21时，漫长的白日却才舍得向这里做最后告别。然而，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又陡然划破这天山脚下的宁静，一场国家级顶尖水准的歌舞盛宴此时拉开帷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为温泉县带来的艺术火种，正烘托着这颗边陲明珠释放其更加璀璨的光芒。

“艺术普及教室”落地温泉 助力多民族文化永葆活力

温泉县城位于海拔1700米的博格达尔山的山脚下，博格达尔在蒙语中意为“神山的背后”。虽然地处遥远，但千年来，在这座神山的注视下，汉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多民族共同谱写出了一曲曲世代传唱的动人歌谣，当地的蒙古族短调更从大山背后传出，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

9月17日，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携国家大剧院歌唱家远赴温泉县，与温泉县乌兰牧骑展开交流，为草原轻骑兵捐赠乐器，并与他们联手为当地百姓奉献了两台高水准的演出，将最优质的文化资源送抵祖国的边境线。

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千余名当地百姓在夜间涌进温泉县文化中心剧场，他们的热情激发出了演员们的高水准表演，将晚会推向又一个高潮。

巴音巴特已经是温泉县乌兰牧骑第五任队长，当天，他全程参与了和大剧院歌唱家的交流以及同台演出，他在演出后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过去，乌兰牧骑的创作和演出条件艰苦，经常“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这次国家大剧院带来的乐器有钢琴、二胡、三弦等，“丰富了我们的乐器品种，让演员的创作、表演和舞蹈编曲更上一个台阶。国家大剧院艺术家与基层艺术团队的深入交流，也让我们受益匪浅，他们千里迢迢的到来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来自祖国的温暖。”

温泉县乌兰牧骑生生不息的传承基因，必然与当地民间世代熏陶和培养密不可分，而小学基础教育则是将艺术种子进行集中播撒的关键阶段。鉴于此，国家大剧院团队本次新疆温泉之行的“重头戏”，则是为温泉县城镇小学精心打造一间“艺术普及教室”。

据了解，温泉县城镇小学是当地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美育教育传统的学校，目前在校学生1052名，其中90%为少数民族。校长王丽娜表示，学校配备了6间音乐教室和4名音乐教师，基本满足教学需求，但面对孩子们更高的艺术渴求，在乐器等基础设备上还难以满足。

而新落成的“艺术普及教室”中，教学一体机、音响、钢琴、合唱台等先进硬件设施一应俱全，师生们还可以通过线上课堂来获取更多的教材和音视频。9月18日上午，在“艺术普及教室”捐赠仪式过后，城镇小学的学生们表演了蒙古舞蹈《吉祥的筷子》、蒙古短调《察哈尔八旗》、维吾尔族舞蹈《快乐的童年》、冬不拉合奏《我的伙伴》、钢琴演奏《喷泉》等精彩节目，展现了多民



“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教室”捐赠仪式(来源:温泉县融媒体中心)

“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教室，采用‘线下空间改造+线上资源赋能’的立体帮扶模式，以‘小空间’激活‘大文化’，既是首都连接边远地区的‘美育桥梁’，也是国家大剧院在边远地区的‘美育阵地’。”

族文化的交融与活力。

此次随队前来的国家大剧院艺术家金郑建、胡越，在惊叹于小小年纪的孩子们有如此艺术天赋之余，分别为学校的社团学生指导演唱《祖国在我心窝里》《卢沟谣》，并为他们上了一场生动的“艺术第一课”。

看到孩子们在艺术家的启发下被激发出的求知欲和表现力，校长王丽娜感慨地说道：“其实不是我们的孩子不行，而是我们原来缺少这样高水平的师资。通过初期课程和艺术家的指导，我们的孩子进步很快，对发声技巧、节奏把控和个人展示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非常感谢，希望有更多这样高水平的专家来到我们这个边陲小城，为更多渴望通过艺术殿堂的孩子提供指导。”

国家大剧院创公益新举 立体扶持乡村美育阵地

而此次挂牌落成的“艺术普及教室”已是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在全国打造的第五间教室。

据了解，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成立于2022年年底，基金会以“资助文化艺术公益项目”为主，围绕国家大剧院“人民性、艺术性、国际性”三项宗旨，构建了全民美育、艺术资助和艺术交流三大项目体系。

“艺术普及教室”是2024年基金会创新开展的公益项目之一。当年11月，基金会首站深入大兴安岭腹地的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为这一鄂伦春族的主要聚居地打造了两间“艺术普及教室”，也为当地的乌兰牧骑捐赠了乐器。除此之外，基金会连续四天在当地举办艺术讲座、歌剧电影放映等8场乡村文化振兴公益活动，惠及鄂伦春自治旗中小学、社区和艺术团体。

今年8月，基金会又前往贵州省台江县，向苗族人口占比高达98%的这一地区捐建两间“艺术普及教室”，为当地两所中学的艺术教育翻开崭新篇章。

可以看到，加上此次新疆温泉县教室的揭牌，已有五间“艺术普及教室”在全国具有丰富民族特色的地区率先落成，正如国家大剧院发展合作部部长、艺术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文卉所说的那样：“艺术普及教室既是首都连接边远地区的‘美育桥梁’，也是大剧院在边远地区的‘美育阵地’。我们期待教室能够融入当地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促进文化传承与交流的生动课堂，真正实现艺术普及与文化活态传承的双向赋能。”

通过对这五间教室的考

察，可以看出，“艺术普及教室”采用了“线下空间改造+线上资源赋能”的立体帮扶模式，旨在以“小空间”激活“大文化”，系统整合国家大剧院线上线下各类艺术资源。

首先，“艺术普及教室”采用环保隔音材料、设计温馨大方，配备齐全，可支持音乐、舞蹈、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教学。

第二，“艺术普及教室”的线上内容丰富，以其中的“古典音乐频道”为例，这是专门为这一项目打造的线上课程，总共包含十课，涵盖“歌、乐、舞、剧、戏”等多种艺术门类，可低成本、高质量、常态化地为边远地区的孩子提供艺术美育资源。

第三，伴随着每间教室的落成，多场艺术表演、指导、讲座、放映等活动同期展开，让学校以外更广泛的人群感受到优质文化直达基层的便利，极大丰富了边远地区百姓的日常生活。

此次新疆温泉县第五间“艺术普及教室”的落成，也标志着基金会这一创新项目稳步迈向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新阶段。

“未来，基金会将持续关注教室的长效运营，不断输送和更新优质资源，不断开发教师培训、学生研学、艺术团体展演等机会，让教室‘用起来、活起来、亮起来’。”黄文卉说。

殿堂级艺术送抵边境线 打造优质文化资源“直通站”

“艺术普及教室”项目在公益属性之外的更大意义还在于，它为国家级艺术家与边远基层艺术工作者提供了交流机会，为殿堂级的文化资源在边远基层的投放提供了直达载体，基层艺术工作者和各地百姓通过交流和演出收获的直观感受，反过来又再次孕育当地基层艺术和文化的良好原因。

20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文件中指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然而，各地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实践过程中，经常反映出文化资源不够优质、资源精准投放难、基层文化机构承接能力有限等问题，使得文化资源往往“卡在半路”。

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艺术普及教室”项目恰恰为这些难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样本，即吸纳殿堂级艺术家、深度结合地域性文化需求、创新基层公共空间。



捐赠仪式上，温泉县城镇小学学生表演冬不拉合奏《我的伙伴》(来源:温泉县融媒体中心)

在吸纳艺术家方面，全程参与和见证了五间“艺术普及教室”落地的男高音歌唱家金郑建为国家一级演员，任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兼演员队队长。

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同时身为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理事的金郑建谈道：“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

队成立十余年来，一直践行着国家大剧院‘人民性、艺术性、国际性’的建院宗旨。其中，人民性放在第一位，就是对我们演员提出的更高要求，即不仅要在国家大剧院这样国际性的舞台上展示艺术水准，同时也要尽自己所能，到基层老百姓身边普及高雅艺术，为更广大的人群服务，这也是彼此的一种幸福。”

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女中音歌唱家胡越在演出间隙也向记者表示：“这次能来到新疆温泉县，与乌兰牧骑的艺术工作者们进行真真切切的交流，对于年轻演员来说，也是吸取养分的过程。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艺术普及教室’则为我们提供了不同形式的舞台，丰富了我们的艺术体验。”

在结合地域性文化需求方面，“艺术普及教室”的捐建地均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群众对艺术种类的接受上存在明显偏好。因此，国家大剧院与地方民族艺术团体精心配合，为当地百姓奉献高雅艺术与地方民族艺术深度融合的舞台表演，并在每一站特别与当地的“非遗”民族艺术家深入互动，重视并协助维护当地优质特色文化的传承。

在新疆温泉站，基金会携艺术家们走访了以马德哩为传承人代表的温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细致了解了托布秀尔琴等民族特色乐器的研发、制作、培训等流程，对当地特色艺术有了直观的了解，这对艺术家在当地与基层艺术工作者的交流、面向百姓的演出和对学生的艺术辅导，都起到了重要的帮助作用。

在创新基层公共空间方面，“艺术普及教室”不仅仅限于教学功能，也不只被框定在物理的课堂空间内，而是以这样一个标志性的物理空间，吸引更多范围群众的关注与参与，通过艺术类表演、讲座、放映及国家大剧院提供的线上资源，让每一项国家级的优质文化资源内容有切实的落地载体和参与渠道。

就目前基金会以及“艺术普及教室”这一项目在艺术公益领域的发刳，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认为，艺术公益是打破资源壁垒，让更多人获得审美启蒙的关键路径。基金会一方面将积极探索多领域融合，拓展艺术公益边界，引入“用户导向”“开放协作”“跨界融合”等互联网思维，探索建立创新型“艺术公益项目模式”，打通新型艺术公益路径；另一方面，也将积极搭建交流平台，联合企业、基金会、艺术家、学者、媒体等多方力量，共同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艺术公益生态。

寻找慈善传统

■ 石晋之

在宋代，各类大规模灾害频繁发生。其中，火灾、水灾、旱灾等灾害的出现频率相对较高，大型火灾约1年3次，大型水灾约1年2次，大型旱灾则约1.5年1次。其次就是大型地震等灾害，约2年至3年就会出现1次。这些大规模灾害给民间带来了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等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有时还会引发蝴蝶效应，造成打砸抢等事件的发生。因此，为了维护治安，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宋代在灾害治理方面，“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其中，民兵中的保甲是宋代应对灾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灾害治理、维系社会稳定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他们一边从事生产劳动，一边充当国防力量。在宋代，民兵又称之为乡兵，闲时务农，战时为兵，其名目不一，或曰“义勇”，或曰“保甲”，等等。宋人许应龙曾在《民兵论》中评价称：“缓则农，急则战。……非恃国之利，亦民之利也。”宋代民兵中的保甲除了“三时业农，一时讲武”，在灾害治理方面亦承担了重要职责。

首先，宋代的保甲在维护基层治理安与保障国防的同时，承担着所在区域的消防职责。

北宋仁宗时期，宋道即已在原州“仿古民兵之法”，“籍居人之附近者十家为保，平时则主火备，有寇则使登城以守”。熙宁期间，北宋政府颁行了《畿县保甲条例》，将保甲推行全国：“凡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心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主户最有心力者及物产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乃选主户有行止材勇为众所伏者二人为都、副保正。……同保内有犯强盗……放火……，知而不告，论如五保律。”根据上述条例可以看出，保甲成员有维护所在区域消防安全的责任，成员内部如有放火行为，其他成员凡知悉者应如实报告，隐瞒不报者，以“五保律”惩处。

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温州火灾频繁，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宋人石牧之出任温州知州，组建保甲，并使其成员共同预防和扑救火灾，以加强火灾治理。苏颂在《朝议大夫致仕石君墓碣铭》中为此评价：“(石牧之)始莅永嘉，病火政素怠，飓风至则燬绵亘，奸人利救焚攘败，吏恬不怪，寢以成弊。因举行火保之令，预为约束使知，有犯联坐。一日火作，亲率部伍，视奋揭缒急之，不悉力者收之，余悉克前，俄顷而扑灭。自是其弊遂革。”可见，石牧之组建的保甲有效加强了温州区域的火灾治理，由此“其弊遂革”。

南宋继续将保甲视为区域消防的重要力量，通过组织民众结保编伍，以强化火灾治理。如建炎四年规定：“十大保为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内，内选才勇、物力最高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盗贼烟火之事，一年得替。”南宋孝宗时期，要求“诸路帅、宪司结定保伍，置办救火、捕盗器仗”，并明确，“诸充保正、副，依条只令管烟火盗贼外，并不得泛有科扰差使”，即各地均应组建保甲防治火灾，其保正、副因消防职责，官府不得随意差使。《庆元条法事类》则对保甲的救火职责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规定：“诸州县镇寨内每十家为一甲，选一家为甲头，置牌具录户名，印押付甲头掌之，遇火发，甲头每家集一名救扑讫，当官以牌点数。”凡火灾发生，保长于每家召集一名成员参与救火，官府“以牌点数”。

由于保甲在区域消防方面能够产生重要作用，故也受到南宋官员的高度推崇。南宋名臣袁甫在各地任职期间即重视组建保甲治理火灾。他在《徽州秦便民五事状》中指出：“本州从来多有火灾……臣自到官以来，首以是(火政)为急务。严保甲图籍，则择防虞官正副八人，皆乡之所推重者总之……。”同样，南宋官员程迈知温州期间，亦“开河渠，立望楼，结火保”，成效显著，受到“诏书褒谕”。总

体而言，组建保甲强化区域火灾治理成为有宋一代的普遍方式。

当然，保甲不仅承担消防职责，还具备其他灾害治理职能。包括预防蝗灾、管理救济粮仓等。按淳熙敕：“诸虫蝗初生，若飞落，地主、邻人隐蔽不言，若保不时申举扑除者，各杖一百。”即保长有预防蝗灾的责任，未尽责者，杖刑一百。在管理救济粮仓方面，如《崇安社仓条约》规定：“每年二月，委派各都社首、保正副编排旧保簿……并询问是否愿意请米，让本人亲自押字。”《清江县社仓規約》则规定：“仓中事务并委乡官掌管，但差使保正编排人户，驱磨磨历、弹压敛散、踏逐仓廩、追断逋负之类。”

实践中，凡遇灾发，官府会要求保甲协助做好相关救济灾民的事务。如《宋会要》记载，绍兴十九年(1149)，上(宋高宗)谕辅臣曰：“近日绍兴饥民多有过临安府者，深可怜悯，盖是保正副抄扎漏落，是致流移。”虽然该内容与“保正副抄扎漏落”导致灾民流移有关，但也间接反映了保甲是协助临安官府救济灾民的重要辅助力量。

又绍兴二十七年(1157)，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朱倬言：“比见郡县之间，自冬继春，所给乞丐钱米，例皆付之胥吏……每岁抄割，委州县长吏令在郡邑者责之社甲首、副，在村落者责之保正、副长，结果保明，使无遗滥。”从之。此“从之”代表朱倬的建言受到朝廷认可，保甲成为协助官府救济灾民的主体之一。以及嘉定八年(1215)，某官员向朝廷报告：“臣来自吴门，沿路眼见近来所差检踏灾伤官与抄札賑恤之官……就近城寺院呼集保甲，取索文状，令人粉壁书街……。”经该官员的报告可以得知，检踏灾伤官与抄札賑恤官会在实践中要求保甲辅助其完成相关救济政务。

另外，南宋理学家朱熹为官期间，在赈济灾民的过程中，亦将保甲作为重要倚靠。如要求，“合赈济人户，黄笔圈栏。逐一仔细填写姓名，大小口数，令本都保正长等参考诣实缴中，切待差官点摘管实”。运送灾粮时，“差保正、隅官防护所余米船”。赈济官粮如经陆路，“即仰保正轮差能担擎余米入户般送，每石依上项计里数支雇米”。赈济前，会“勒逐都保正将置场处用棘刺夹截作两门，两重极小，只通一人来往。外门之内、里门之外，须极宽，可容一场粮米。里人外门之侧为一窗，后夹截交钱位于一间，依使军立去样式，告示保正夹截。发放赈济粮过程，如有“施行阙食未尽抄割人等事”，还会指令保正按照“巡察官所行事理”，“随门再行审实”。若保正“若保正依前开裂，不即同隅官抄割及将元冒滥人盖庇，或在乡乞覓人户分文钱物，仰隅官具状陈诉，切待追究，重作施行”。

总体而言，具有民兵性质的保甲是宋代应对灾害、治理灾害的重要依仗力量，为宋代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如今，民兵作为国家武装力量体系的组成，不仅是我国的重要后备武装力量，同时，他们在国家的灾害治理层面也担负着抢险救灾的重要使命。刚刚过去的2025年7月29日，华东、东北等地持续遭遇暴雨，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民兵迅速行动，配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抢险救灾，使受灾群众得到安全转移。这正是民兵为我国灾害治理做出贡献的有力证明。

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灾害治理工作提出了新指示，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提升新时代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快建设“全灾种、大应急”的灾害治理体系。由于民兵具备一定的体能和军事素质，且具有“人地两熟”的先天优势，能够成为区域应急救援的突击队和生力军，因此，加快完善民兵参与灾害治理的制度与机制，构建“‘预防—应对’全链条覆盖的参与模式”，是构建“全灾种、大应急”灾害治理体系、形成“灾害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保障。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